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一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二七五期 ——
（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 k 0 1 1 1 d）

【追根溯源】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	佚名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述略	葛恒军
【文献资料】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	
上的讲话（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	刘少奇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刘少奇
文革后复查和平反的冤假错案	
【史海钩沉】开除刘少奇出党时惟一人没举手赞成	董保存
刘少奇冤案复查经过	杨筱箴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cnd-cm@cnd.org。请在 s u b j e c t 中标明 C R 字样。

【追根溯源】

毛、刘分歧与“文革”的发动
• 佚 名 •

◇ 刘少奇批评“大跃进”

毛泽东雄心勃勃地在经济领域进行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在3年困难时期已严重地暴露出弊端，为了公开而比较彻底地纠正其错误，于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开了有七千人参加的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毛在1月30日的会上对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毛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的这个自我批评并不深刻。当他听到刘少奇在会上对最近几年来的错误深刻的批评，对当前经济困难的严重估计，特别是对三面红旗所明确表示的保留态度，毛表现出非常不满。刘在讲话中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份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可是，全国总的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不服……”刘在家乡湖南宁乡县花明楼作过调查，早就提出“人祸”是造成全国大多数地方困难的主要原因。

◇ 毛泽东要维护“三面红旗”

毛所谓承认错误，是指在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实际工作中所犯的 error，对“三面红旗”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认为这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法宝。错误只是下面的干部群众执行中央正确的路线发生的错误，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线、任务有什么错误。因此，他对刘的批评十分不满，突然在自我批评后，借谈民主、集中问题话题一转，出人意料地提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份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毛说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强调以政治运动、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模式，并且毛在这里更是强调“高度的集中”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与前面以民主的姿态所作的自我批评大相径庭。毛这里隐晦提出的严厉警告，在1967年2月，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谈话中，才拨开了云雾，此时刘已被打倒。毛说，我们党内的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专政的国家。

在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遍游南北名山大川，自称“做了徐霞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请陈云“出山”，主持计划经济的管理工作。他们对经济困难的局面作了充份的估计，并部署调整工作。

1962年7月至9月底，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毛首先对刘少奇等对形势的估计提出批评，说“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份黑暗了。引得一些同志思

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这两年讲困难讲黑暗合法，讲光明不合法了。这次会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11月，毛泽东又说：“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成一片黑暗。就像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揭露黑暗，人们是不喜欢看的，鲁迅把它叫做谴责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人们爱看，因为它有希望嘛。《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它的淫秽，主要是因为它只揭露黑暗。会上，有的同志说：‘三面红旗’究竟打不打？现在似乎理不直、气不壮了。有的同志说，大跃进似乎很难开口了，简直就不好提了……。”

对此，刘少奇不得不作自我批评。

◇ 刘少奇支持“责任田”

所谓“单干风”，是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率先在该省试验的一种“责任田”，即包产到队、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责任制。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田家英等对此非常热情，毛却甚为反感。认为这是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一再地对“单干”进行批评，甚至是严厉指责，说现在刮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就越大。毛还从中寻找出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对象来，并成了毛发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

毛泽东对“单干风”可谓刻骨铭心，把它归纳为“三自一包”（工商业自负盈亏、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农业的自留地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邓子恢由此一再遭到严厉批判，连他担任部长的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田家英亦遭批判，受到毛泽东的冷遇，曾支持责任制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也受到毛泽东的指责。

毛泽东在发现“修正主义”就在党内时，便说服全党接受他在全中国农村开展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并进而发展成为“挖修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作为国际反修与国内防修的重要措施。这场从农村开始的政治斗争强化了毛泽东阶级斗争理论的绝对化和“合理性”。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解决农村社教运动中的问题作出研究和安排。毛泽东与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的性质及社教运动如何进行，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成为两人政治关系转变的一个分水岭。

12月20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这一问题上，毛断言：“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刘一再坚持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反问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次年1月5日，毛泽东再次对刘的观点进行批评，并严厉地提出运动的重点是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明白地指出，“走资派”指的就是一部份老干部。1月3日晚，毛在一个小型会议上不点名地尖锐地批评刘的这种运动搞法，当天，是三届人大选举刘为国家主席的日子。

◇ 毛对刘极端不满

在此次会议前后，还发生了一些耐人寻味的事件插曲，也反映了毛对刘的不信任、不满已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11月底，毛泽东针对他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下放指导四清运动效果不明显、而刘少奇一指示却有许多干部下去的情况，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12月26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邀请部份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一起过生日。席间毛指责刘少奇关于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的提法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并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实际上指邓小平及其书记处、李富春及其主持的国家计委）。毛并提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

毛由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时提出警惕匈牙利事件到60年代初防止修正主义，再到这时一再提出警惕“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中央”，直到提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毛要打倒刘的决心已难动摇了。

1966年4月下旬，刘出国访问回到北京。此时的国内，已是政治运动箭在弦上，《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彭真已被打倒，高校造反学生，有“星火燎原”之势。刘的处境十分为难。政治人物开始大分化、大改组，以前曾追随刘的陈伯达、王力等人都急剧“左”转，迫不及待地要与他划清界限。

毛对中央第一线的猜忌、不信任已达到顶点，但在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合法地清除刘少奇等人，毛没有一定的把握。因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希望以群众盲目的政治热情和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神”的形像及多年来形成的国内阶级斗争环境来达到这个目的。

红卫兵运动在各高校、中学如野火般燃烧，呈不可阻挡之势，“打倒刘少奇”运动全面推向社会。

1966年12月13日，应毛泽东之约，刘少奇与毛泽东作了最后一次交谈。刘向毛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湖南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只是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并介绍法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狄德罗的《机械人》。两人再无话可说。最后，毛在送别时，对刘只说了一句：“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这两位共事40余年的战友、同乡最后一次会面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

1967年1月18日，刘少奇家电话被拆除，与外界联系被切断。4月上旬，造反派闯入刘宅，勒令刘今后必须自己做饭、打扫卫生、洗衣服，改变夜里工作、上午休息的作息习惯。7月18日晚，中南海秘书局造反派经江青同意，在中南海大灶食堂举行揪斗刘少奇大会，这是刘第一次遭到公堂批斗。8月5日，毛泽东所写《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并刊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天安门广场还召开了浩大的300万人的誓师大会；中南海内则由康生之妻、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指挥，召开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会；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王光美被捕入狱，关押秦城监狱12年，并以莫须有罪名大批逮捕有关人员。

1969年10月7日，生命垂危的刘少奇被战备疏散到河南开封，负责看守的中办负责人拒绝提供一切必需的医疗条件，11月12日晨4时，刘停止呼吸，年71岁。病历上写着“该犯除患有支气管炎、慢性气管炎和轻度糖尿病外，主要病症是肺炎。”14日，刘的遗体以“烈性传染病”被秘密火化。“文革”中因刘案受株连判刑者28000多人。

□ 摘自《炎黄春秋》

∞ ∞ ∞ ∞ ∞ ∞ ∞ ∞ ∞ ∞
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述略
• 葛恒军 •

◇ 座谈会的由来和简况

1965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敲响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场锣鼓。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由江青出面组织、在严格保密的状况下写成的。尽管许多地方报纸纷纷转载，但北京各报刊迟迟未动。为了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彭真等人的抵制以及《二月提纲》的产生，不仅引起江青的极大不满，而且成为江青在上海搞“纪要”的重要背景，特别是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使“纪要”升级的重要背景。

在江青的责难下，《解放军报》于1966年11月29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为进一步借助人民解放军的威望、影响，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江青于1966年1月21日，专程从上海到苏州找正在那里休息的林彪，提出要召开一个部队

文艺工作座谈会，说是请“尊神”。她的要求得到了林彪的赞同和支持。随即由“林办”主任叶群出面，电话通知当时分管宣传、文化工作的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要总政治部确定四、五个参加人选。

会议地点由江青确定在上海。总政治部按照林彪的指令，决定派副主任刘志坚和宣传部长李曼村、文化部长谢镗忠、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参加。2月2日刘志坚等一行6人（包括秘书和《星火燎原》编辑部一名编辑）乘飞机到达上海。当天下午，江青在其住处丁香花园召见刘志坚，刘志坚即把叶群委托其转达的林彪的“几句话”转达给江青。林彪的“几句话”是：“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江青听完后，面露喜气，随即对刘志坚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下午5时，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等召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到场的还有张春桥。一开始，江青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提出“不准让北京知道”，还查问到会者有没有带窃听器。而后谈了文艺方面的问题。江青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舞台”，“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现在该是我们专他们的政的时候了”。还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江青的这次谈话，实际上为座谈会和后来的“纪要”定了调子。晚上，江青与刘志坚等人一起看电影。

座谈会从2月2日开始，到20日结束。中间因江青有事，10日至15日未开会。据当事人刘志坚回忆，10多天的座谈会主要活动是四项：

“1. 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2. 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

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次谈话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听完就散。3．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4．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她认为既然叫《南海长城》，就不能只有民兵，还要有陆军、海军和空军，现在这个样子不行，人物表演、艺术，都不行，要进行修改等等。”（注：刘志坚：《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载《中共党史资料》第30辑。）

◇ “纪要”产生的经过

座谈会结束后，刘志坚出于要向总政治部常委汇报的考虑，当即与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精神和每次谈话后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讨论，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记录，陈亚丁修改，于2月20日晚整理成约3000字的题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汇报提纲。这个汇报提纲连夜打印后，刘志坚于第二天给江青送去一份。22日，刘志坚等乘飞机到济南后，又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去一份。江青看了这份汇报提纲很不满意，认为“座谈纪要（指汇报提纲）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歪曲了她的“本意”。要求已回到北京的刘志坚派人去上海，由她帮助修改。在江青的主持下，汇报提纲三易其稿，最后形成《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第一次大修改，时间在2月底。座谈会结束后已回到北京的陈亚丁受萧华和刘志坚的委派于2月25日携带原稿返回上海。26日张春桥接陈亚丁到锦江饭店，与江青、陈伯达一起商量修改问题。陈伯达谈了预先准备的意见，后来反映在“纪要”里的主要有两点：一是他说“十七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三十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十七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二是他提议“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芭蕾舞、交响音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陈伯达谈的意见受到江青称赞，说“意见很好”，“击中了要害”。当日，陈亚丁按照江青的要求，把陈伯达的意见和张春桥已经改过的稿子，连同自己根据追记补充的内容，全部改写在一份原稿上。27日上午经张春桥与陈亚丁商量又对稿子作了些改动。晚上江青召集张春桥、陈亚丁一起对修改稿进行讨论，而后由陈亚丁再修改一遍。28日上午经张春桥、陈亚丁文字加工，晚上读给江青听，得到江青认可。这次大修改，对汇报提纲结构未作变动，但在内容上作了很多的增删与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文字由原来的3000字增加到5500

0 字左右。题目虽还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但不是原来那个汇报提纲了。

第二次大修改，时间在3月上中旬。3月1日，陈亚丁带着被江青认可的那个修改稿回到北京。与此同时，江青把稿子铅印了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在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几个字，形成了后来下发的文件标题，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稿子共作了十多处的修改，其中既提出了一些错误观点，如“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等；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如对“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等。毛泽东阅改后，还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于是，江青先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个人一起从12日至14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

第三次大修改，时间在3月中下旬。这一阶段实际是定稿阶段，主要做了四件事：一是江青把第二次大修改的万字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又先后作两次修改。17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3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二是毛泽东批示后，江青又把刘志坚、李曼村、谢镗忠召到上海，说是征求意见，其实是商量定稿。三是此时住在上海的林彪收到江青3月19日的信和“纪要”稿后，当面指示刘志坚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这封信起草后经林彪修改审定。23日刘志坚返回北京，将带回的“纪要”稿和《林彪同志给贺龙等同志的信》，分送军委常委们征求意见。四是刘志坚了解到军委常委们都划了圈，30日将事先准备好的以军委名义给中央的报告加以修改，与“纪要”稿以及江青3月19日给林彪的信、林彪3月22日给贺龙等军委常委的信，一并报送中央。至此，“纪要”算是正式定稿，全文约9300字。

“纪要”报送中央后，4月1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4月10日，“纪要”由中央办公厅以211号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印发时，中央加了一个148个字的批示，指出“纪要”“很好，很重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事后，因中央要对批语增加“新的补充”，5月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10日前收回211号文件，同时发出文件号不变、时间不变、有新批语的“纪要”。新批语约800字，写了四层意思：一是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存在“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是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三是确认“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四是规定文件印发范围和传达范围。

4月18日，《解放军报》以社论的形式摘要刊登了“纪要”的内容，并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1967年5月29日，“纪要”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发表时在文字上作了多处改动，删去了第三部份的十条措施，并配发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文件》的社论。同一天，《红旗》杂志也发表一篇社论，题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把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1966年2月7日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当年2月12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诬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面黑旗”。它把“纪要”称之为“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

◇ “纪要”的主要内容

“纪要”分为三个部份。

第一部份，记述了座谈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座谈的内容及座谈会的过程和方式，其中全文照录了刘志坚向江青转达的林彪吹捧江青的那段话。

第二部份，集中概括了这次座谈会上所谓“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认识”的十点意见，是“纪要”的核心部份。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诬称新中国成立“十六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断言“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

第二，宣称从1964年以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京剧“革命”已“带动文艺界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这是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将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创举”。

第三，断定“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内部来”，“军队的文艺工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黑线的影响”。

第四，吹捧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对文艺工作抓得很紧，作了很多很正确的指示”。主张解放军要“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中”“起重要作用”。

第五，鼓吹“文化革命要有破有立”，“要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在“要破除对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口号下，攻击我国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口号下，借批评斯大林，否定“中国的古典文艺，欧洲（包括俄国）古典文艺”。宣扬正在进行的所谓“文化革命”“是一次最后消灭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和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的革命”。号召人们“做一个彻底的革命派”，去“创造”“社会主义的革命新文艺”。

第六，指责文艺工作不走“群众路线”，存在着一种“逼着领导人鼓掌、点头”的“很坏的作风”。责令对“坏作品”“不要藏起来，要拿出来交给群众去评论”。还点名要《解放军报》写文章批判影片《兵临城下》。

第七，指责文艺批评家的现状是“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表示要打破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号召在文艺批评中，要“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开展“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还指责一些人撰写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京剧剧目初探》等著作，是“伪造历史，提高自己”，散布了许多错误论点。鼓动“要有计划地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怕有人骂我们是棍子”。

第八，煽动反对“修正主义文艺”的斗争，不能只提“小人物，要提大的”。要求“军队组织一些人加以研究”，写出“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很大影响”的批判文章。

第九，鼓吹“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像”时，“不要受真人真事的局限”。甚至诬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些作品是“歪曲历史事实，不表现正确路线，专写错误路线”；有些作品“不写英雄人物，专写中间人物”；有些作品虽写了英雄人物，但“人为地制造一个悲剧的结局”；有些作品“美化”敌人，有些作品“专搞谈情说爱，低级趣味”。并把这些归结于都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必须坚决反对。

第十，断言“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大城市，许多同志没有抵抗住资产阶级思想对我们文艺队伍的侵蚀”，“有的在前进中掉队了”。扬言要“重新教育文艺干部，重新组织文艺队伍”。

在十点意见中虽也写了一些正确的话，如肯定“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斗争的左翼文艺运动”；“选择题材要深入生活”；文艺工作者要“不为名，不为利，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等。但这些正确的话，有的还是毛泽东修改时加上的，绝非江青一伙的本意。

第三部份，对军队如何“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这次座谈会成果，提出了十项措施，总共不超过260个字。

□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5月25日

~~~~~

#### 【文献资料】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编注：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起，北京市各大中学校都派了工作组，六、七月间，北京市的文教机关，共派出了7239名工作队员。七月二十九日，在人民大会堂

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

根据中央的指示，为了更好地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师生的高度革命热情和自觉性，更有力地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目前所采取的在大专院校派工作组的做法，经验证明，已不适应上述的革命要求；因此，决定撤销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

各大专院校应在统一的会场，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这个决定。

根据各校的具体情况，由本校各单位提名，成立临时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全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宣布上述决定后，上级派到各校的工作组应在该校集中学习，听取群众意见；有的因工作需要，可以离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要他们全组或其中成员回校的时候，可以随时回去。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 ∞ ∞ ∞ ∞ ∞ ∞ ∞ ∞ ∞

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  
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  
• 刘少奇 •

（一九六六年七月廿九日）

同学们，同志们！

我同意邓小平同志、周恩来同志的讲话。

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学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现在所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晓得要革命，怎么办？就在革命斗争中去实践。在革命中间经过各种曲折，犯了一些错误又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各种情况都遇到了。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大概你们也会遇到，因为今后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是在一种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革

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都是在革命中间来学会革命的。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在运动中间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就要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革命中间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使你们在这次运动中间能够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使之成为你们斗争的武器。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是什么，刚才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讲了，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第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第三进行教育改革，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针、教学方法。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完全依靠各学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来作，才能搞好。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恩来同志、小平同志、雪峰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如果多数同学让他们走，就走；如果多数同学不让他们走，还有意见，要提意见，要批评，你们就批评，批评够了，他们向你们作检讨，多数同学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再走。有些人要抽出来工作，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据多数同学的要求，要他回去，就回去。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各工作组组员的工作，更不会完全一样。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或成绩，由你们多数同学作结论。至于讲某个人的历史情况及其他情况，你们就不大清楚，总的结论你们也不能作，由其他机关去作。

现在，你们高等、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作主，你们是主人，如果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同时，学校的某些工作你们如果暂时不能接收，他们可以暂时维持一下，等选出你们多数同学相信的人，能够接收的时候接收。你们的选举完全由你们办，怎么选？当然要经过大家酝酿讨论，多次反复地酝酿成熟了，再选举出来。以后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由你们作主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援你们。但是，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首先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一个时候，然后看出一些什么问题，有点什么经验，我们可以提一提。

现在你们的责任更重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于全国有重大意义，对于将来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有重大意义。我愿意到你们哪一个学校或者哪几个学校去向他们学习，刚才周恩来同志要求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这个自由，我愿意到学校里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那个可能，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学校的情况。

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一点建议，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有辩论，刚才周恩来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怎样保护少数？就是说对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做了错事的人，讲了错误话的人，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因为是多数的，大家一打就不好了。不要轮流跟他辩论，使他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他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他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可以参加辩论会，可以不参加，可以退出会场，要让他走。因为他是少数，大家骂他，各种帽子都来了，讲话中间没有分寸的多了，有的站在桌子上讲，举起拳头讲，青年人嘛，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这个时候他要溜，准许他走。暂时不愿意讲他的意见可以不讲。辩论会，不过是大会辩论、小会辩论，会内辩论、会外辩论；或者大会讨论，小会讨论，会内讨论，会外讨论。对学生和教员中的一般问题，尽可能开讨论会，不开辩论会。各种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经常有的，有了不同意见就要进行谈论或辩论。所谓保护少数，主要是这几条。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人？保护少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反动的大字报，贴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大家可以跟他辩论，也要保护一下。因为他是少数。他只写了几张大字报，只贴了几句标语，只讲了几句话，定他为反革命分子，定右派、定假左派，材料还不够，证据还不够，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时候，让他多讲一点，最后就可以作结论，不然，结论不好作嘛。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人揍，公安机关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让他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让大家都看一看，不妨大局嘛，可能保护少数的坏人，例如，保护几个月，以后再作结论。这个时候就有充足的证据，作结论就不会错，不会冤枉人。如果妨碍、影响全局，那就要大家讨论或辩论，不影响全局的就暂时放任一下，但要提高警惕，让

他去活动，在这中间发现他的反革命线索，有好处嘛。保护少数，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同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短时候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垮的，多数人不会听他的，能够识别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什么不是反革命。我到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是晚上去的，看了三个钟头。有一张大字报写了前校党委保护一个学生薛X，那个人的思想很反动，大概还在学校，让他活动嘛，让他讲话，让他贴大字报。在运动中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分子，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进行活动，暴露出来，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和饮水里面下毒的人要抓起来，对群众有威胁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活动，活动一个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几个月，不是一茬齐，最后作结论，最后定案。定了案以后，是反革命分子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他乱说乱动。没有定案就不许他乱说乱动，最后作结论的时候，材料就不够，就不能定案。怎么样定案，要经过你们大家讨论，还应该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该在运动后期来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我只提这么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否对，你们是否同意，请你们考虑，请你们去决定。

∞ ∞ ∞ ∞ ∞ ∞ ∞ ∞ ∞ ∞ ∞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 刘少奇 •

（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份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

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份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方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

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份地发表出来，充份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个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



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份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X X X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同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

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完全不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

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的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

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说明：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四日曾对刘少奇《在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检讨提纲（草案）》批语：“少奇同志：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根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13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 ∞ ∞ ∞ ∞ ∞ ∞ ∞ ∞ ∞

### 文革后复查和平反的冤假错案

从1978年至1982年底，在全国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中，据不完全统计，此期间，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了三百多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四十七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其中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有：

（一）为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如科学家赵九章、熊庆来，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艺术家周信芳、郑君里、严凤英、潘天寿、盖叫天，上海市副市长、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等平反昭雪。在这期间，中央军委为许光达平了反。

（二）为天安门事件，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新疆叛徒集团”问题、“东北叛党集团”问题平反。对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六十一人，受刘少奇指示，“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问题，已由中央1978年12月16日中发75号文件予以否定。文件指出：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六十一人案是一起重大错案”。

（三）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军队领导人平反

（1）三中全会为邓小平、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平反。

(2)为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肖劲光、肖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和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平反。79年到80年，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作出结论报中央批准平反的就有445人。

(3)还先后为“文革”前受到错误批判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平反。

#### (四)为党和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平反

从1979年到1982年，为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周小舟、张琴秋、邓拓、廖沫沙、徐冰、张经武、吴溉之、邹大鹏、伍云甫、章汉夫、赖若愚、董昕、冯雪峰、马明芳、王维舟、贾拓夫、张子意、安子文、陈昌浩、李德生、杨献珍等人平反。1980年9月19日，中央发出通知，对“文革”中在中央、地方以及军队的报刊、电台上被错误点名批判的同志，宣布一律平反。

#### (五)对省部级干部复查审理平反冤假错案

“文革”前，全国共有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1253人，“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有1011人，占81%。其中由各地各部门立案审查，被诬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司令部代理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有453人，占总数的36%。这还不包括由原中央专案组直接审查的人数。其中有40位在“审查”期间含冤逝世，还有一些人造成终身残疾。对干部的所谓审查，大都是捕风捉影、捏造诬陷、扣上帽子、无限上纲、实行专政，从而使这些干部长期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中央组织部受中央委托从1978年开始到1980年12月底，先后对453名副省长、副部长以上干部的结论进行了复查或审理。“文革”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85人，全部平反，恢复名誉；过去有历史问题结论，“文革”中又加码定性处理的，大多数维持了“文革”前的结论。经过落实政策，身体好、能工作的干部平反后都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身体不好的做了适当安置。含冤逝世的进行了昭雪，彻底恢复名誉。因冤假错案受到株连的人和家属子女，做了消除影响的工作。

#### (六)对全国各地发生的事件、案件进行复查平反。

为天安门的事件平反。为武汉七二零事件、宁夏青铜峡“反革命暴乱事件”、云南沙甸事件、“三家村”冤案、“新内人党”冤案、“内蒙古二月逆流”冤案等进行了平反。

#### (七)为被错误的反革命案件、刑事案件、冤杀、错杀案件予以改判或平反。

据不完全统计，“文革”中，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10402人，加上其他案件，共判处死刑23921人，冤杀错杀情况相当严重特别是以反革命定罪而冤杀错杀的很突出，遇罗克、张志新、史云峰等就是典型事例。各级人民法院对此做了大量的纠正、改判或平反昭雪的工作。

## （八）为中央和国务院的下属部门平反

主要有：

- （1）撤销了所谓中共对外联络部实行“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错误结论；
- （2）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
- （3）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
- （4）为把原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 （5）为解放军总政治部被诬为“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
- （6）为把档案工作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错案彻底平反；
- （7）撤销了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 （8）撤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九）中央郑重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作出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

（1）撤销中发〔68〕152号文件（即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和对他处理决议，相应地撤销中发〔68〕155号文件（即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荣誉。

（2）在适当时间，由中央商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为前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会。

（3）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都应当由有关主管部门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和澄清，凡属冤假错案，一律予以平反。

（4）全国因刘少奇冤案受株连的有数万人的冤假错案也都得到了平反纠正。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狱中病故。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举行平反昭雪追悼大会。

~~~~~

【史海钩沉】

开除刘少奇出党时惟一人没举手赞成

• 董保存 •

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冤案时，胡耀邦曾不止一次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家都犯过错误，都举了手。就是陈大姐没有举手，没有犯错误…
…

这位陈大姐是何许人也？她是否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她怎么就敢公然唱反调？她是一时冲动还是深思熟虑？

1968年11月1日，全国的广播喇叭里都广播着同一个声音：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0月31日在北京胜利闭幕。人们听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必要……非常及时。”“刘少奇……叛徒……一致决议，……永远开除……一切职务……”

就在全国的宣传机器宣传“一致通过”的时候，陈少敏，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像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战士，用手中的拐杖敲着地，对来探望她的老同志说：“一致个屁，我就没举手！”

她是带着病参加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她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肾脏严重下垂，腿脚已经很不利落。按照医生的“判决”，她已是病入膏肓了。

那时，很少使用投票的办法进行表决，也没有当今的电子计算机显示计票，通常采用的是鼓掌通过或举手表决。播音员宣读完《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便是举手表决了。

“同意的请举手！”

齐刷刷的手臂先后举了起来。有人举过头顶，有人借助桌面举起，也有人不那么情愿地抬起臂膀……

“好，一致通过。”此时此刻，趴在桌上，用庄严的右手捂住左胸的陈少敏，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表示自己鲜明的态度。

不知是工作人员的疏忽，还是出于对陈少敏大姐的爱护，反正没有人在会场上把这一情况讲出来。

事后，那位戴眼镜的“康老”，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你为什么不举手？”

同康生打交道，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权利。”

陈少敏的态度，令不少关心她的人担心。在她身边工作的同志尤甚。司机项怀玺至今记得清楚，散会那天，他去接陈大姐，见她脸色很难看，就问：“大姐，你不舒服？”

“不是。今天开会开除刘少奇的党籍，我不同意。”

项怀玺担心，这是中央的全会，不能有不同意见啊！“你不举手，他们……”

陈少敏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权利。”

她得到的评价是：政治觉悟还不如农村老太太高。按照“文革”期间的说法，扩大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召开的。除台湾省外，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此时召开全会，解决中央的问题不正是大好时机吗？

可是，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被定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罪名的占总数的71%。中央委员不够半数，无法开全会。但是，事在人为，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十人，就过了半数。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等，都“扩大”进来，总数达到133人。

陈少敏是党的八届中央委员，是会议的当然代表。然而开会的前一天，她还没接到任何通知，甚至是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她怎么能知道呢！从1967年开始，她就成了受冲击的对象。扣在她头上的帽子很多，什么“刘少奇在全国总工会的代理人”，“中原突围时的叛徒头子”等等。在全总机关挨批斗，还拉到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坐“喷气式”……

周恩来总理想到了她。当他发现报到名单上没有陈少敏的名字后，就派中央办公厅的人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去问明情况。挂着军用车牌号的北京吉普来到复兴门外的全总大楼时，得到的答复是：陈少敏是叛徒，不能让她参加中央的会议。中央办公厅的人说，会议马上就要开了，周总理要我们来问情况、送通知的。在中央办公厅的催促下，他们还是放行了。

陈少敏后来回忆说：当我拄着拐杖走进人民大会堂时，全会就要开始了。周总理叫我的名字，我答了一声：“到！”

上一次（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她才明白这场运动要打倒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少敏很愤懑。她从理智到感情上，都不能接受“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说法。开会休息时，她有意坐在刘少奇同志身边，同他谈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情，以此安慰少奇同志。十一中全会散会后，全国总工会的一些同志到陈少敏家中，想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内部情况”，她告诉同志们，少奇挨批是真的。说着说着，眼泪直往下流。她想不通，她有意见。后来她流泪的消息传了出去，“她是刘少奇黑线上的重要人物”这一帽子，又有了新的材料。

不管怎么批判和围攻，陈少敏拒不写揭发刘少奇的任何材料，对来要材料的造反派说：“刘少奇同志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10月23日的小组会上，讨论

《审查报告》，陈少敏做了一个“检查”。与其说是检查，不如说是给刘少奇开脱所谓罪行，这必然招来严厉的批评。有人说她“根本没有同刘少奇划清界限”。有人说她“思想上不通，和中央的精神有抵触。”……随你们怎样说，陈少敏还是不明确表态。

二十四日，继续开会。陈少敏成了江青、康生一伙的重点攻击目标。“陈少敏，对中央专案组的审查报告，你到底是什么态度？”“这是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刘少奇的罪行，你应该清楚，你和他在一起工作过那么长时间！”陈少敏拍拍眼皮，回答一句：“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康生站起来说：“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后果，陈少敏早就考虑到了。没有充份的精神准备，她是不敢这样说的。“你这个人，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哩！农村老太婆的觉悟都比你高！”这是同一小组的一位人士对她的评价。这句评价印在了当时的简报上。这时，陈少敏已经下了决心，要在开会时不投赞成票。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陈少敏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举动，大大触怒了林彪康生等人。从此以后她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文件停发，该参加的会议也不让参加了。她的心情越来越坏，身体也越来越不好。林彪又发布了所谓“一号命令”，对老干部、老同志实行紧急疏散。陈少敏当然在疏散之列。此时，她的心脏病、关节炎及肾脏的疾病已相当严重，卧床不起，已不能行走了，她硬是被几个人抬着上了火车送到河南罗山。

陈少敏于1977年12月14日逝世。她1902年出生在山东省寿光县范于村。1928年入党。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仅有三位女委员，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位是邓颖超和蔡畅。

□ 摘自《北京青年报》

∞ ∞ ∞ ∞ ∞ ∞ ∞ ∞ ∞ ∞ ∞

刘少奇冤案复查经过

• 杨筱箴 •

曾任“刘少奇案件复查组”负责人的杨筱箴的访谈记录摘登如下——

◇ 群众普遍要求复查少奇冤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在这个期间，群众对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反映很强烈，主要是对三顶帽子，就是“叛徒”、“工贼”、“内奸”，认为这三顶帽子不可靠，不可信。这样一个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怎么就成了“叛徒”、“工贼”、“内奸”呢？不相信，普遍要求复查。有些干部群众给中央领导写信，特别是一些老干部，还有农村党的支部书记，都表示对这个问题接受不了。后来我们跟原来的专案人员接触了，他们也说那些材料是不扎实的，水份很大，心里明白这个问题迟早要平反。这是他们专案人员反映的，包括那些专案组副组长。还有就是一些老干部，比如王鹤寿同志，奉天这个事他前后都清楚，是没有问题的。少奇同志当时在奉天被捕，就是在沈阳，党的组织、党员根本没有

受任何破坏，也没有受任何影响，大概是20多天就放出来了，身份没暴露。这个情况王鹤寿同志清清楚楚。所以他说这个事情完全是冤案。

◇ 420多卷档案看了一个多月

这些反映信送到中央，先是陈云同志批的，说这个事情要复查。因为陈云同志对一些情况也了解。后来小平同志也批了，批示由中央纪委和中央组织部共同复查。这样批了以后，由中央纪委牵头，1979年4月18日成立复查组。我4月17日从山西调到中纪委工作，4月18日就负责复查组的工作。复查组的组成情况是这样的，中央纪委两个人，组织部两个人，再有就是中央党校、军队等单位一共8个人组成复查小组。少奇同志这个案有420多卷档案，再加上王光美、冯少白等其他一些有牵连的案卷，好像是570卷档案。首先得把这些档案的来龙去脉审查清楚，然后是外调。看案卷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到5月下旬就看完了。外调分了两个组。一个组去武汉、长沙、上海这几个地方，这主要是调查1925年、1927年这两个时期的问题。1925年长沙被捕，1927年是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问题很复杂。这里面有一个人叫丁觉群。是原武汉国民党党部的工作人员。他揭发了13个问题，工人纠察队缴枪是其中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到武汉、长沙、上海，找有关人去复查。

◇ “证人”20次翻供

还有一个组是去东北，主要是搞1929年奉天被捕这个事情。这个问题主要是有孟用潜，当时满洲省委组织部长，和少奇同志一起被捕。还有一个刘多荃，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主要是这两个人的口供。专案组把这两个人关了四年多，一直关到1972年，围攻、逼供，让他们写材料。

把孟用潜一直关了五年，围攻、逼供、诱供多少次，白天黑夜批，没有办法就造假，搞假口供。后来他自己觉得不对，关押期间20次翻供，给毛主席写信，说那是假的，是捏造的，不是事实。1972年把他放了，他还继续向中央申诉说那是假的，是逼得他没有办法，不得不编造。我们复查组同孟用潜见面是在医院，他身体很不好，但是他要翻供还是清楚的，他说已经写了几十次申诉信了。

武汉的丁觉群已经死了，但是他死以前也四次翻供。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接着替他申诉，说过去说的是假的。还有一个陈元桢也很典型。他还叫陈冠英，不认识几个字，是当时警察分局一个侦查班的班长。专案组把他硬是关起来七八天不让睡觉，连轴转，围攻他，叫他说。最后是专案组的人给他念，让他抄，完了让他盖手印，就是证据了。这些东西非常滑稽，逼供、诱供，搞得非常离奇。后来我们找到陈元桢，他详细地讲了这些东西。

所以问题很清楚，“三顶帽子”完全是莫须有，假证据。

我们复查组没找江青调查。因为在400多卷档案中，江青等人写的那些东西，清清楚楚，批的东西也清清楚楚。要找江青，她肯定也是赖账。

有些同志在医疗方面提出了一些怀疑。因为有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就受过迫害，人家给他吃一种药，然后就呆了。这些同志也跟我们谈过，是不是给少奇同志吃那种药了，后来什么话都不会说了，就在床上躺着，什么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后来也弄不清楚了。反正当时少奇同志的情况是要药没药，要营养没营养，到开封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是非常惨的。我们听到这种情况不止一次掉泪，真是太惨了。

从档案中看，江青批的最多，“三顶帽子”就是她给戴的

复查组成立以后，主要在中纪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直接领导的是王鹤寿同志。当时王鹤寿同志召集我们复查组的同志开会，讲了两点。一点是实事求是，不带框框，对“三顶帽子”进行认真的调查，把问题搞清楚。第二点是对一些可疑的问题也要搞清楚。例如所谓通过王光琦给美国送情报等等这些事情。王光琦的问题是台湾特务搞的反间计，后来调查搞清楚了，完全是陷害。最后我们把原来专案组报告中的其他反革命罪行七条都搞清楚了。

我再说一说“四人帮”迫害刘少奇同志的情况。从档案中来看，江青批的最多，她直接抓这个案子。她的批示一个是多，一个是长，这“三顶帽子”就是江青给戴的。再一个就是张春桥、姚文元也插了手。刘少奇专案的复查报告最后是张春桥执笔，姚文元修改的，从档案里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康生也插足了。比如说1925年少奇同志在上海

搞工运斗争，因为病得很重去长沙养病这个事，当时报刊写得清清楚楚，专案组就歪曲说少奇同志是畏惧斗争，潜逃回长沙。当时康生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完全可靠，就是潜逃。这是康生参与搞诬陷的一件事。

□ 摘自《经济生活报》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